

撤销国际化的危险

汉斯·德·维特

汉斯·德·维特 (Hans de Wit)：美国波士顿学院 (Boston College)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(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) 荣誉教授

电子邮箱：dewitj@bc.edu

观察当前高收入国家围绕高等教育及其国际化展开的辩论——包括讨论限制国际学生招生规模、加强对知识安全的关注、以及对与特定国家合作的学者和机构的攻击——人们不禁要问：高等教育国际化 50 年来的进程是否已走向终结？我们是否正在“撤销”国际化？

这一问题成为 2024 年 11 月 27 日伦敦大学学院 (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)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(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) 与布里斯托大学 (University of Bristol) 高等教育转型中心 (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s) 联合举办的一场网络研讨会的主题。会议从多个角度讨论了这一议题：民族主义与反国际主义、国家安全、市场化与竞争以及社会责任。在过去 50 年里，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在当前复杂的全球环境中，回顾国际化的演进历程并展望其未来可能的衰退与转型，显得尤为重要。

从乐观主义走向新自由主义

20 世纪 80 年代末，高等教育国际化从一系列边缘化、零散、临时性的活动，逐渐演变为高收入国家高等教育战略中更为系统、整体的一部分。

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乐观的时期，合作、交流与团结占据主导地位，尽管在澳大利亚

和英国等部分英语国家，市场化和竞争已初露端倪。随着铁幕的倒下、欧洲教育和研究计划的推进，以及全球化过程中对知识生产与合作的需求不断增长，高校得以更多地参与国际化建设。

然而，进入 21 世纪前后，国际化的主导逻辑开始转向更加竞争性与市场导向的模式。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北方推动国际化的主要动力，中低收入国家，即全球南方国家，也成为主要对象。

尽管反作用的力量也存在，例如欧洲的“本土化国际化”(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) 运动、澳大利亚与英国倡导的“课程国际化”(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)、美国呼吁的“全面国际化”(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)，以及全球南方推动的去殖民化课程等；但这些举措的影响通常有限，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，未能真正改变国际化的主流模式。此时，排名体系、政府政策与收入创造目标，以及愈加激烈的市场化竞争，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化的核心因素。

新冠疫情并未阻止这一趋势。疫情消退后，全球北方的教育体系迅速恢复“常态”；而在全球南方，国际化呈现两种路径：一方面，在机构层面：发展本土化国际化愿景、强调区域合作、推动去殖民化课程，以及利用数字化开展协作式线上国际学习与虚拟交流；另一方面，在国家层面：依旧聚焦国际学生招

生、软实力建设和跨国教育。

国际化被拆解

当下的地缘政治紧张与冲突、反移民与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情绪和政策、以及民族主义，都挑战着回到以往新自由主义式国际化“旧常态”的可能性。各种迹象显示，高收入国家正在远离竞争与市场化：限制或冻结国际学生招生、强调知识安全、终止与中国、伊朗、俄罗斯等国家的研究合作与学术交流。

这种对国际化的“拆解”趋势变得愈发严峻。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的选举结果，都暗示着这些国家正在拆除国际化。明显的例子包括：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荷兰和英国政府采取行动减少国际学生数量，以及欧盟和多国政府推动强化知识安全，即所谓的“负责任的国际化”（但其中“负责任”已不再指对全球社会负责，而是指对“我们的安全”负责）。

一种激进的“撤销”

在全球北方，这种对国际化的撤销，有些人将其视为对新自由主义的撤销，并不意味着回到合作、交流与团结的传统价值观。相反，它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整体的一种激进式拆解。这非常值得关注，因为它与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的预算削减、以及技能劳动力短

缺并行发生——从任何角度看，这都是不利且矛盾的。尽管可以质疑一些全球南方政府的动机，但南方国家的趋势似乎恰恰与北方相反：它们正在发展不再依赖全球北方、甚至与之竞争的国际化理念与政策。

国际化不能脱离当前高等教育发生的整体变革来看。阿特巴赫（Philip G. Altbach）和我曾在《大学世界新闻》（*University World News*）中写道：“全球高等教育与研究界，尤其是其领导层，必须意识到当前政治右转带来的挑战，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应对它们，寻求克服的方法。这不仅符合高等教育界自身的利益，更关乎全球社会的利益。把头埋在沙里，是 2025 年及未来几年最危险的做法之一。”这句话对高等教育整体适用，对国际化领域更是如此。

当前的发展趋势为高等教育界提供了一个契机，同时也提出了要求：重新评估并重新构想国际化，使其成为一种具有社会责任与包容性的行动——无论在全球北方还是全球南方。撤销国际化不是解决方案，而是问题本身。

注：本文基于作者在 2024 年 12 月 4 日《大学世界新闻》（*University World News*）上发表的文章的更新版本。